

张太雷与青年共产国际

——以新见俄文史料为中心

葛银丽

摘要 张太雷是中国共青团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新近发现的《青年国际》俄文版1924年第3期（7—8月号）上刊登的《我们在东方的任务》一文，实则出自张太雷的手笔。他在文中详述了对于东方青年运动的理解，呼吁在东方殖民地国家广泛建立青年组织，争取青年共产国际的指导和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共青团的援助。文章发表之前，张太雷在青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展开活动，为东方殖民地国家积极发声，引起了青年共产国际的关注。张太雷发扬了列宁有关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论述，推动共产国际将目光投向东方青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重要位置。

关键词 张太雷 青年共产国际 东方青年运动 殖民地

作者葛银丽，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雅博士后（北京100871）。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25)05-0208-9

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迅速投入到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等各项革命事业之中。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会议通过《青年运动决议案》，为8月在南京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了方向。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作为青年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始终与之保持密切联系。1924年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青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下文简称青年共产国际四大）上，就留下了中国代表的身影。^①

笔者在俄罗斯查阅档案期间，在青年共产国际机关刊物《青年国际》俄文版1924年第3期（7—8月号）中发现了一篇题为《我们在东方的任务》的文章。^②浏览这篇文章可知，作者建议在东方殖民地国家建立广泛的青年群众组织，呼吁青年共产国际关注东方青年运动；而同期杂志刊登的其他文章，也集中反映了青年共产国际四大的主要精神。因此，本文将首先梳理《我们在东方的任务》一文的主要内容，明确作者的身份；继而利用若干俄文一手文献，分析张太雷在青年共产国际四大期间所扮演的角色；最后尝试结合列宁有

① 关于张太雷与共产国际的研究，有黄爱军：《〈张太雷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材料来源考——兼谈1921年“三月会议”是否存在》，《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8期；亚历山大·潘佐夫：《张太雷与布尔什维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徐光寿、徐馥：《张太雷在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关系中的作用探析》，《上海党史与党建》2021年第3期；蔡明菲、纪亚光：《张太雷1921年在伊尔库茨克的史实探析》，《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1年第7期；丁言模、李良明：《张太雷研究新论》，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蔡文杰、王龙腾：《张太雷与共产国际》，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等等。

② Чан-Га-Лей, “Наши задачи на Востоке,”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 Молодёжи*, No. 3, 1924, сс. 14–17.

关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理论，观察张太雷与共产国际、东方青年运动之间的互动。

一、《我们在东方的任务》及其作者

俄文写作的《我们在东方的任务》一文约 1300 词，其内容主旨如下：

首先，文章从帝国主义列强对殖民地国家的剥削展开论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国家虽然是战胜国，但由于长期深陷战争泥淖和战败国无力支付赔款的双重影响，加强了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劫掠，旨在恢复行将崩溃的资本主义制度。一种是经济剥削：六年间，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原料出口和工业商品进口都急剧增加，生活成本因此飞速上涨，进而“引起了小农经济的破产，大大加速了手工业的崩溃，造成本国制造业的长期经济危机，同时伴随着失业者的迅速增长和小资产阶级的整体赤贫化”。^①另一种是政治剥削手段，虽名为“和平”条约，实则借此瓜分殖民地以服务自身利益。

帝国主义国家的剥削催生了印度、中国、土耳其等国的民族运动，“起初是一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运动，随后逐渐发展为工农群众运动”，此外还有工农独立开展的“以大罢工和经济斗争为表现形式的经济斗争”^②。其中青年的表现尤为积极，原因在于“相比成年人，他们更易受到剥削，与旧偏见和传统的联系也更为薄弱”。^③同时，作者表示尽管此前的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明确提出了建立群众组织的任务，且经过数年努力，在东方国家有所成效，但依然任重道远。

继而，作者剖析了东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条件，认为要开展符合国情的青年运动。许多东方国家仍处于封建环境，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农业，现代工业极不发达。从事生产资料的是大量青年农民、小资产阶级青年、小手工业学徒，离直接建立群众共产组织仍有距离。即使在工业发达的日本和印度尚难以实现，鉴于工人阶级刚刚出现、政治压迫、老旧传统、宗教成见等原因。^④正因如此，作者认为应当寻求其他的青年组织形式，即“必须建立广泛的带有民族或阶级印记的青年组织”^⑤。

接着，作者根据各国现实情况，逐一给予如何建立青年群众组织的建议。其一是日本，已有相当数量的青年工人和农民组织，不少都受到日本共青团的影响，所以日本同志的任务是“提升工农青年的需求，形成日本劳动青年的统一战线，将已有的青年工农组织集中联合为统一整体”。其二是印度，主要分为两派——由资产阶级政党领导、以国家自治管理权为目标的宪政运动，及无产阶级和农民自发组织、以反对国内外资产阶级与地主为导向的群众运动，可见印度民族运动情况复杂。因此，在印度既要利用现有的青年群众组织，还需寻求英国共青团的援手。其三是中国，已有在共青团领导下的全国学生会，但还应致力于吸纳青年工农，具体措施组织俱乐部、教育机构等。其四是朝鲜，朝鲜的青年学生和农民虽已讨论了建立全国青年组织的问题，然其中的无产阶级青年占比较少，因此朝鲜共青团的任务是加强在这一未来全国性组织中的影响力。^⑥

此外，在许多东方国家几乎没有青年工人：在波斯和土耳其多为青年农民，在“蒙古”青年牧羊人为主要力量；南非的共青团成员大半是白人，将来在日常工作中必须与黑人问题结合起来。因此，作者总结：“在其他国家建立青年组织时，也应该根据各国客观条件选择相应的形式。”^⑦

建立包容性组织是发展共青团的重要条件，有助于增进共青团成员与广大青年的联系。不过，出于容易沦为机会主义的考虑，作者建议必须对共青团成员进行严格的集中管理和良好的内部培训，以期强化纪律。共青团必须谋求在群众组织中掌握领导权，具体包括：组织上建立支部，个人则应在斗争中敢为人先。只有如此，共青团才能赢得所有非共产主义者群众组织的信任。^⑧接着，作者援引了青年共产国际四大的决议，增强论述的说服力，即“共青团在领导青年群众组织的政治、经济和教育工作时，也决不应忽视开展广泛的共产主义宣传和加强自身组织的必要性”。^⑨

作者强调，来自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共青团的援助颇为关键。此前青年共产国际的历次大会虽然多次指出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 Чан-Та-Лей, “Наши задачи на Востоке,”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 Молодёжи*, No. 3, 1924, с. 14, с. 14, с. 14, с. 15, с. 15, с. 16, с. 16, с. 16.

了这一点，却一直未能付诸实践。作者认为，帝国主义国家共青团应在两方面做出努力。一方面，对内要在本国无产阶级中开展工作：“帝国主义国家的青年团必须坚定不移地在本国无产阶级中开展有利于他们与被剥削的殖民地群众合作的运动。同样地，这些共青团也应在本国士兵、殖民地学生和欧洲港口的东方海员中展开宣传；确保当他们返回祖国后所有这些人能成为优秀的团工作者。”^① 另一方面，对外要在口头与实践向殖民地被剥削民众表明态度，以英国共青团为例：英国政府假借工人阶级的名义执政，实则对殖民地推行帝国主义政策，“英国共青团应该竭尽全力帮助殖民地的被剥削民众，消除他们对英国无产阶级的偏见，形成反对英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②

在文章结尾，作者再次重申青年共产国际密切关注东方青年运动，以及在东西方青年运动间建立紧密联系的必要性：“整个东方革命运动、特别是阶级运动的开展，要求青年共产国际密切关注在这些地区的工作。在东西方青年运动之间必须建立迄今为止所没有的紧密联系。青年共产国际不仅要依靠数百万的西方青年，还有数百万被剥削的东方青年。它应该被正确地视作全世界被剥削青年的世界组织和领袖。在共产国际的政治领导下，它应该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东方劳动者推翻世界资本主义最革命的先锋队。”^③

简言之，文章共有两层含义：一方面，东方殖民地国家的共青团员要积极参与民族解放运动，在本国建立广泛的青年群众组织，同时严格管理团员纪律，以此确保在东方青年运动中的领导权；另一方面，青年共产国际和西方共青团，要关注和援助东方青年，以便共同推翻帝国主义。此外，文中配有三幅题为《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图片，刊载了中国军人的形象，第一幅下附有简短介绍：“孙逸仙军队中为摆脱欧洲、美国、日本帝国主义者、实现民族解放的中国士兵”。^④

文章对东方青年运动的洞见令人印象深刻，笔者不免疑问：作者“Чан-Та-Лей”是谁？为了考证这一问题，需要从文章出处——《青年国际》入手。《青年国际》是青年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分别用俄、德、英、法等各国语言逐月发行，俄文版（8—9月号）于1920年在莫斯科创刊。《青年国际》俄文版侧重于介绍世界青年运动现况、共青团的工作方法和注意事项等，不时会刊登有关亚洲青年运动的文章，作者多为苏联负责东方事务的共产国际工作人员，如青年共产国际驻远东书记处代表达林（А. С. Далин），或是片山潜这般具有声望的东方共产主义者。^⑤ “Чан-Та-Лей”（发音类似 Chan-Ta-Lei）显然是亚洲人名。加之文中三幅国民革命军的配图，作者无疑是中国人——特别是国共合作下的共产党人。

进一步来看，《青年国际》俄文版1924年第3期（7—8月号）刊登的九篇文章中，六篇有作者署名，除“Чан-Та-Лей”外，其余五人均是可以证实的参加青年共产国际四大的各国代表。^⑥ 例如，该期第一篇文章《写在青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后》的作者是时任青年共产国际总书记、青年共产国际四大主席团成员武约维奇（Войслав Вуйович），他撰文介绍了青年共产国际四大于各国共青团之意义。^⑦ 而在《我们在东方的任务》一文中，作者也两次援引了青年共产国际四大的决议。因此，“Чан-Та-Лей”很有可能是青年共产国际四大的与会代表。

两相比较，《我们在东方的任务》一文的作者“Чан-Та-Лей”应是参加青年共产国际四大的中国代表。笔者在有关青年共产国际四大的档案中，发现有“Чжан-Тай-Лей”，这是张太雷在今天通用的俄文译名。“Чан-Та-Лей”与“Чжан-Тай-Лей”之间，只有两个字母的差异，且发音近似，因此不妨推定，文章的作者即为张太雷本人。事实上，在共产国际的各种文件和苏联报纸中，有关张太雷的俄文译名长期存在着发音相

①②③④ Чан-Та-Лей, “Наши задачи на Востоке,”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 Молодёжи*, No. 3, 1924, с. 16, с. 16, с. 17, сс. 14–17.

⑤ Сен Катаяма, “Японская молодёжь и её движение,”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 молодёжи*, No. 1, 1920; С. Далин, “Съезд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Молодёжи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30 Янв. - 2 Фев. в Москве и Петрограде),”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 молодёжи*, No. 6, 1922.

⑥ 其他五位作者和文章题目分别是：武约维奇（Вуйович）《在青年共产国际四大后》、步马特（З. Баматтер）《青年共产国际与经济斗争》、费·京特（Ф. гюннер）《我们的教育工作》、奥戈·温格尔（Огго Унгер）《青年共产国际的反对派》、里赫·吉普特纳（Рих. Гиптнер）《青年共产国际——布琼尼师长》。

⑦ Вуйович, “После IV Конгресса КИМ,”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 Молодёжи*, No. 3, 1924, с. 1.

近的不同版本。例如，1923年，在青年共产国际为张太雷出具的执行委员会委员证明中，其俄语名写作“Джан-Тан-Лэй”；^① 1924年，张太雷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成立三周年之际发表演讲，档案中记录的俄文名为“Чан-Та-Лай”，身份标注为“中国共青团主席和青年共产国际委员会成员”；^② 甚至在苏联官方报纸有关青年共产国际四大的报道中，也存在不同版本的“张太雷”。^③ 从文章内容来看，作者不仅了解东方殖民地国家的青年运动状况，而且熟悉青年共产国际的各项决议，且能够对青年共产国际提出建议并被接纳。作为中国共青团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青年共产国际四大中国代表张太雷，无疑符合上述条件。由此可以断定，张太雷就是《我们在东方的任务》一文的作者。

二、张太雷与青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

虽然已经确定张太雷是《我们在东方的任务》一文的作者，但该文与青年共产国际四大的关系尚不清楚。为此，有必要对张太雷在会议前后的活动加以考察。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可供研究的中文史料相对有限。^④ 达林在回忆录中写道：“张太雷曾在青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进行讨论时发言。在谈到共青团员必须积极参加民族革命运动时，他着重强调指出了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保持独立的共青团组织的重要性。张太雷始终站在共产国际的立场上，他在思想方法方面、在精神上都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⑤ 这段追忆虽然简单，但肯定了张太雷在青年共产国际四大上所起到的作用。

1919年10月，青年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柏林秘密召开，明确其是无产阶级青年的国际组织。^⑥ 1920年7—8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规定青年共产国际是“享有充分权利的共产国际成员”，隶属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⑦ 1921年7月，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为此青年共产国际专门派人来华相邀：“派遣代表的事，对于中国革命将有极大的结果。因为派代表的缘故，中国才第一次与国际社会运动接近。”^⑧

此后，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青年的联系不断增多。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青年共产国际驻远东书记处代表达林出席。团一大通过决议，一致同意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加入青年共产国际，成为其支部。^⑨ 同年12月，青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赞誉中国青年运动的迅速发展，但也指出存在组织薄弱、纪律不振、沉迷理论等问题。缺席的张太雷当选为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⑩

1924年7月15—25日，青年共产国际四大在莫斯科召开，来自五大洲的144名代表参会，其中108名代表具有表决权，分别是：欧洲代表85人，亚洲代表14人，美洲代表7人，澳大利亚和非洲代表各1人。^⑪ 不

① 蔡文杰主编：《张太雷画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92页。

② РГАСПИ: 532-2-10. 英文记录为：From Chantaly, Representativ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and member of Executive Committee of Youth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③ 《真理报》使用的是 Чен-Та-Лей，而《消息报》为 Джан-Тай-Лайн，“IV конгресс Коминтерна молодежи,” Правда, No. 168, 20 июля, 1924, с. 5; “IV Конгресса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а Молодежи,” Известия, No. 166, 03 июля, 1924, с. 3.

④ 潘佐夫曾在文章中简略提及张太雷在青年共产国际四大上作过两次发言，丁言模、李良明在专著中推测张太雷在共产国际五大和青年共产国际四大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蔡文杰主编的《张太雷画传》中则提供了相关图片。参见丁言模、李良明：《张太雷研究新论》；亚历山大·潘佐夫：《张太雷与布尔什维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蔡文杰主编：《张太雷画传》，第100—101页。

⑤ Далин С. А., *Китайские мемуары 1921—1927*,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1982, с. 183; С. А. 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侯均初、潘荣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57—158页。

⑥ 程玉海等：《青年共产国际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0—46页。

⑦ 《共产国际章程》，王学东等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30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678—682页。

⑧ 《万国青年共产党写给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信》，《共产党》1921年第4期。

⑨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大会》，《先驱》1922年第8号。

⑩ 《青年共产国际给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书》，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编：《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第137—138页。

⑪ Метринг Р. А., *Четвертый конгресс*, (15-25 июля 1924 г.), Москва-Ленинград: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31, с. 18.

难发现，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的社会主义传统深厚，参与了共产国际的创建与组织，拥有相当话语权。兴起不久的亚、非、拉、美洲国家代表数量相对较少。

7月15日，会议在莫斯科大剧院开幕，确定了主席团和书记处的人员组成。7月1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曼努伊尔斯基（Д. З. Манильский）作关于世界形势和共产国际任务的报告。^① 7月17日，大会主席团成员许勒（Шюллер）从与党内不良倾向斗争、青年政治教育、各国现状等方面回顾了青年共产国际三大以来的活动情况。具体而言，关于西方国家共青团运动的介绍较为详细，而涉及东方青年运动的篇幅相对较少。他简单地指出，中国的共青团主要由学生和知识分子组成，团员数量曾由1500人增至3000人，但在经济危机后有所下降；而在“蒙古”、爪哇、土耳其等共青团组织内部，团员人数相对少；至于印度和波斯，共青团组织则完全属于萌芽状态。^②

张太雷在会议期间一共有两次发言，分别是在7月18日和23日，引起相当反响。7月23日晨会的讨论主题与工会相关，张太雷汇报了中国共青团参与无产阶级经济斗争的情况：中国共青团是青年工人斗争的领导者，积极参与到所有罢工之中。^③ 相较而言，张太雷在7月18日晨会上的发言更为重要。当日晨会的主题是讨论此前许勒和曼努伊尔斯基的报告。张太雷在发言中强调了东方青年运动的意义及其与西方青年运动的联系，其主旨与上节详述的《我们在东方的任务》一文部分相似。

张太雷在7月18日的分组讨论中指出，许勒的报告忽视了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共青团对东方国家共青团的协调问题，并由此阐发了自己的论述。在参与这场分组讨论的代表中，除张太雷外均来自欧美国家。故而，只有张太雷注意到许勒在此问题上论述的不足，提出了“东西方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的协调问题，特别是帝国主义国家青年团工作对殖民地青年工作的协调”，重申了列宁1920年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提出的“帝国主义国家共产党应当在予以殖民地无产阶级政党援助”的精神。^④

张太雷首先指出，东方青年对待民族运动之原则，是青年共产国际应当关注和指导的问题。东方青年应该积极加入本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之中，尽力取得领导权，尽管这一理念在实践上面临着不少困难：“一方面，加入民族运动中，我们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可能会被融合；另一方面，我们的共产主义青年团也因此胆怯，而可能通过不会积极参加这些运动来表达忽视。因此，我们知道这是一条必须要走的险路”。^⑤ 但这恰恰成为青年共产国际应该持续关注和指导东方运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张太雷还就东西方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的协调问题提出了具体建议。他以英国共青团为例，批评他们没有利用麦克唐纳政府对印度问题的态度，指出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趁机向印度青年表明“英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而非工党才是英国工人阶级的代表，而这正是合作的必要性”。^⑥ 同时，英国共青团还要消除英国无产阶级的民族和帝国主义心理，以便结合英国和印度两地的运动。张太雷呼吁：法国同志应当在殖民地和军队中开展工作，美国同志也应该在黑人中积极活动；而以白种欧洲人为主导的南非共青团，应当扩大其在黑人中的影响力，争取在下次青年共产国际大会上出现黑人代表的身影。^⑦ 18日晚，张太雷的发言得到了朝鲜代表的声援，后者也批评许勒对东方国家关注不够，表示大会应将在东方的工作问题放在首位。^⑧

对于张太雷的建议，许勒在7月19日分组讨论会的结束致辞中表示，他欣慰地看到与会代表希望加强东西方国家共青团之间相互交流的共同愿望，承认“建立东西方分部之间的交流具有重要意义。这是规划问题，

① “IV конгресс Коминтерна молодежи,” Правда, No. 168, 20 июля, 1924, с. 2; “IV Конгресса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а Молодежи,” Известия, No. 168, 17 июля, 1924, с. 3.

② “IV конгресс Коминтерна молодежи,” Правда, No. 168, 20 июля, 1924, с. 5; “IV Конгресса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а Молодежи,” Известия, No. 170, 20 июля, 1924, с. 3.

③ “IV Конгресса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а Молодежи,” Известия, No. 166, 03 июля, 1924, с. 3.

④⑦ 《青年共产国际四大第四次会议记录和速记》（1924年7月18日），РГАСПИ：533-2-15。

⑤⑥ 《青年共产国际四大第四次会议记录和速记》（1924年7月18日），РГАСПИ：533-2-15；蔡明非译，王力校注：《张太雷在青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载《近代史资料》第138号。

⑧ “IV конгресс Коминтерна молодежи,” Правда, No. 168, 20 июля, 1924, с. 5.

我们需要尽快解决它”。^① 许勒认为，尽管在沟通上存在问题，但青年共产国际仍然是青年工人国际运动的总指挥部，每个国家的青年运动都值得所有分部关注和学习。同时，他还专门提到了《青年国际》杂志，强调它“虽然薄弱，却是各分部相互交流信息的基础，尽管如今在巴尔干、美洲、东方等地尚未很好发展”。^② 会上，张太雷继续当选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

青年共产国际四大结束不久，《青年国际》俄文版 1924 年第 3 期（7—8 月号）以大会专刊的形式发行。在 144 名与会代表中，张太雷及其《我们在东方的任务》一文是唯一来自亚洲的声音，俨然代表了整个东方青年运动。同一时间，《青年国际》的中文版《少年国际》创刊：“少年国际执行委员会见于现在他的中国分部的发达和中国青年运动的重要，决议出版中文版的少年国际杂志。中文版的少年国际的责任是很明显的，就是给中国少年共产团团员以主义上的、组织上的和行动上的指导。”^③ 虽然《少年国际》出版仅此一期，但这些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青年共产国际中的地位呈现出上升态势。

三、民族与殖民地视角下的东方青年运动

1924 年 7 月青年共产国际四大期间，张太雷积极发声，呼吁青年共产国际和西方共青团组织对东方青年运动多加关注。会后不久，《青年国际》俄文版刊登张太雷的文章，主旨一脉相承：东方共青团需要发展青年群众组织，青年共产国际则需要加强领导作用。张太雷的相关论点，实则反映了共产国际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整体路线。

列宁围绕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相关论述，奠定了共产国际在东方开展革命运动的理论基础。1919 年共产国际成立之初，工作重心原在欧洲。1920 年，列宁在共产国际二大上首次提出：“共产国际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全部政策，主要应该是使各民族和各国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为共同进行革命斗争、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而彼此接近起来。”^④ 会议期间，围绕东方革命和欧洲革命的重要性问题，列宁和印度革命者罗易（M. N. Roy）展开深入讨论，形成了《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决议》和《补充提纲》。^⑤ 此后，共产国际的整体路线得到明确：落后的殖民地国家可以与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开展谨慎合作，甚至可以形成临时联盟，但前提是保证无产阶级运动的独立性。^⑥

然而，由于缺乏经验，共产国际无法立刻将列宁的指导用于实践。列宁本人坦言：“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但无法预先制定具体方法，只能从实际经验中获得启示。^⑦ 荷兰革命者马林（Hendricus Sneevliet）回忆首次来华曾言：“没有给我什么专门的指示。我仅有的事先准备就是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的讨论和提纲。”^⑧

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民族与殖民地理论的理解，经历了逐步深入的过程，张太雷是最早一批的接受者。1921 年 7 月中共一大期间，与会代表讨论了《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决议》的部分内容，但并非会议重

① “IV конгресс Коминтерна молодежи,” Правда, No. 168, 20 июля, 1924, с. 2; “IV Конгресса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а Молодежи,” Известия, No. 170, 20 июля, 1924, с. 3.

② “IV конгресс Коминтерна молодежи,” Правда, No. 168, 20 июля, 1924, с. 2; “IV конгресс Коминтерна молодежи,” Гудок, No. 1250, 23 июля, 1924, с. 2.

③ 《〈少年共产国际〉杂志中文版发刊词》，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编：《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第 137—138 页。

④ 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列宁全集》第 39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160—169 页。

⑤ 《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王学东等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 30 卷，第 636—642 页。

⑥ 《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王学东等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 30 卷，第 642—644 页。

⑦ 《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王学东等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 30 卷，第 636—642 页；《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王学东等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 30 卷，第 642—644 页。

⑧ 伊罗生：《与斯内夫利特谈话记录——关于 1920—1923 年的中国问题》，《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17—1925）》，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年，第 251—258 页。

点。1922 年 1 月出版的团刊《先驱》创刊号，刊登了节译《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决议》的前半部分，反而侧重于强调采取对抗资产阶级的原则。^① 同年沈泽民的译本，在关键概念上含糊不清，理解为“与中产阶级的民族主义革命合作”。^② 相较而言，张太雷在 1921 年 6 月向共产国际三大提交的报告，得益于共产国际驻远东书记处书记舒米亚茨基（Б. З. Шумяцкий）的指导，更加贴合列宁的理论。张太雷认为，东方殖民地内部各有差异，必须根据国内外阶级力量的对比，因地制宜地采取不同政策：“不要丢掉自己纲领和组织的独立性，要掌握住各国的民族革命运动，要把参加运动的群众从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下争取到自己一边来……”^③ 对于资产阶级，首先要尽可能努力，迫使他们暂时向革命运动靠拢，继而在必要时将之驱逐。张太雷不仅掌握了民族与殖民地理论的核心，而且意识到东方殖民地内部的多样性。

1924 年 1 月列宁逝世后，在东方殖民地国家开展活动已久的共产国际，需要重新审视和总结四年来的经验教训。自 1920 年起，莫斯科就在中国寻找可能的合作对象，最终选定了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1923 年 8 月，蒋介石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到莫斯科商谈合作事宜，张太雷作为翻译随行。1924 年 1 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决定以俄为师、学习布尔什维克的组织经验。1 月 21 日，列宁病逝，留在莫斯科的张太雷参加了迎灵仪式：“中国人民对于列宁底死亦应是无限的悲哀，因为他们失掉了一位领导世界革命，就是领导他们革命的领袖。”^④ 共产国际在继承列宁有关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精神的同时，需要根据世界形势和各国状况进行调整。

1924 年 6 月 17 日—7 月 8 日，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围绕民族与殖民地问题展开激烈讨论。大会的殖民地委员会主席曼努伊斯基（Д. З. Мануильский）批评以法共为代表的西方共产党对殖民地问题关心不足，讨论了是否在殖民地国家“建立有着相当激进的反帝斗争纲领的工农党”，甚至将有中共党员加入的国民党归入此类的说法。^⑤ 李大钊介绍了国共合作下中国民族运动的发展，呼吁大会更加关注中国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并不大。它的战线太长，因为它同时开展工人运动和民族运动……我们希望第五次代表大会给予中国问题以特别的关注，对中国党作出有关它今后工作的指示。”^⑥ 斯大林担心，工农党的成立可能会使共产党完全“溶化”于其中，因而选择搁置决议，留待下次大会解决。^⑦ 最终，大会通过了《共产国际致东方各国和殖民地的兄弟人民》，呼吁东方人民跟随列宁的革命遗训，奋起反抗，争取民族解放。

不过半月，青年共产国际四大开幕，并将贯彻共产国际五大的方针，作为这次会议的任务之一。因此，东方各国和殖民地的青年运动，也成为会议期间需要具体讨论和研究的对象。^⑧ 会议前夕，苏联共青团成员、青年共产国际四大主席团成员塔尔汗诺夫（О. С. Тарханов）曾就会议前景和意义进行展望，但对东方问题只是简略带过。^⑨ 不过，青年共产国际苏联代表库雷拉（Курелля Циглер）对此有所认识。在苏联共青团莫斯科支部联合大会上，他阐述了青年共产国际四大的任务，强调要发挥列宁主义的作用，尤其是要加强“被压迫的殖民地人民斗争和西欧无产阶级斗争之间的联系”。^⑩ 库雷拉称赞远东地区青年运动的发展，最亮眼的中国分部“已经成为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因此这次大会必将处理一些实际而非理论的问题。^⑪

① 《译述：第三国际对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所采的原则（未完）》，《先驱》创刊号，1922 年 1 月 15 日。

② 成则人：《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广州：人民出版社，1922 年。

③ 《关于殖民地问题致共产国际“三大”的纲领（草案）》，《张太雷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 32—34 页。

④ 《列宁底死》，《张太雷文集》，第 122—124 页。

⑤ 《曼努伊斯基作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王学东等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 38 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 年，第 201—217 页；*Пятый всемирный конгресс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а, 17 июня-8 июля,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часть первая*, Москва-Ленинград: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1925。

⑥ 《讨论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王学东等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 38 卷，第 262—313 页。

⑦ Панцов А. В., *Тайная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большевики и китай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1919—1927*, Москва: ИД Муравей-Гайд, 2001。

⑧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я IV Конгресса К. И. М.*, Москва-Ленинград: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25, с. 3。

⑨ Тарханов О. К., “IV мировому конгрессу КИМа,” *Юный Коммунист*, No. 8, 1 июля, 1924, с. 201。

⑩⑪ Курелля А., “Перед IV конгрессом КИМа,” *Юный Коммунист*, No. 9, 12 июля, 1924, с. 276。

青年共产国际四大闭幕之际，会议通过《关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核心讨论了东方国家的共青团如何发展青年群众、援助国民革命等问题。^① 具体来看，决议内容包括以下四点。其一，肯定殖民地国家共青团组织已经取得的成绩；其二，明确青年团的任务是要“掌握广大劳动青年群众和建立自己的组织”；其三，分析了有关青年的民族革命组织问题，形式上需要结合各国的实际情况，组织上需要保持政治独立，任务则是要捍卫广大青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利，特别是共青团要积极在其中掌握主动权和领导权；其四，要求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共青团努力帮助殖民地国家的被压迫青年，如设立殖民地工作部门、开展宣传工作以消除本国人民的民族偏见等。^② 通过与本文前两节内容的对比，这份决议与张太雷在7月18日的发言和《我们在东方的任务》一文中的论述，具有相同的主旨和相似的观点。

会议结束之后，不少青年共产国际代表都陆续谈到了东方问题，并强调率先建立具有民族革命性质的青年群众组织的必要性。1924年9月，武约维奇表示，要在农村工作和东方各国及殖民地中组织革命青年，他们“将是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殖民地各国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发展和我们的工作经验促使青年共产国际四大提出新的口号：成立具有民族革命性质的青年群众组织。”^③ 考虑到这些国家的主要任务仍是民族解放，且由于共产主义力量尚且有限，因此青年共产国际四大提出的口号被加以修改：“建立比我们的阶级组织更能接触殖民地青年工农的群众组织。这些群众组织必须在我们的领导下工作。”^④ 此外，青年共产国际四大书记处成员梅林（Р. А. Меринг）在总结会议意义时表示，这次会议的最重要成果之一，就是“解决了在殖民地国家的一些工作问题”。^⑤

由此可见，张太雷在会议期间和会后文章中的呼吁颇有成效，但不少青年共产国际代表对于东方问题的理解仍然有限，只是简单认为东方青年受到了帝国主义在经济和民族方面的双重压迫。例如，塔尔汗诺夫曾表示，西方国家共青团的工作路线已经大体明确，而东方仍是“一本秘而不宣的书”，他们对于一些基本问题不甚了解。^⑥ 不过，他也承认“殖民地和民族问题是青年共产国际现在关注的中心……我们可以使大规模的民族革命运动成为现实。我们现在必须着手进行这项工作”。^⑦ 尽管张太雷《我们在东方的任务》一文，在宣传青年共产国际的路线和精神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如何在东方青年运动中发展青年群众组织，仍然有待在革命实践中不断摸索。

小结

综上所述，张太雷在青年共产国际四大期间扮演了重要角色。1924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上的转折之年——世界革命的领袖列宁逝世，中国国内的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共产国际有必要继续讨论有关民族与殖民地问题。青年共产国际四大前后，东方殖民地国家的青年运动问题没有获得足够重视，不少青年共产国际代表对此一知半解。中国代表张太雷注意到这一不足，发言申明东方青年运动的重要性。青年共产国际也将张太雷的《我们在东方的任务》一文刊登在会后发行的《青年国际》杂志上，以期加强东西方共青团之间的交流。

张太雷认为，东方共青团需要积极建立青年群众组织，青年共产国际和西方共青团则要加强以东方的指导和援助。不过，他对前者的阐发相对有限，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对后者的意义更加重视，也符合青年共产国际的宣传策略。但这种局限性，是由于张太雷身处莫斯科的国际环境，为引起关注所致。张太雷延续了列宁有关民族和殖民地的理论，结合了东方青年运动的实际情况，影响了青年共产国际的决策和认知。

在20世纪20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舞台上，新生的中国共产党人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苏联和拥有社会主义传统的西欧国家拥有更多话语权。例如，许勒在1924年7月17日的报告中有关德法两国的论述，仍

① 《少年国际第四次大会关于殖民地之新议决案》，《张太雷文集》，第164—166页。

② 《青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关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编：《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第139—145页。

③④ Вуйович В., “IV конгресс Коминтерна молодеж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 No. 7, 1924, сс. 41—50.

⑤ Меринг Р. А., *Четвертый конгресс*, (15-25 июля 1924 г.), Москва-Ленинград: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31, с. 18.

⑥⑦ Тарханов О., *Итоги IV конгресса КИМа*, Москва-Ленинград: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25, сс. 40—43.

然占据相当篇幅。本文的研究旨在说明，在青年共产国际四大上，张太雷为东方殖民地国家积极发声，推动共产国际向东方投入更多目光。由此，以张太雷为代表的中国革命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做出的贡献，值得深入研究。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 76 批面上资助项目 (2024M760051) 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周 奇)

Zhang Tailei and the Young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GE Yinli

Abstract: Zhang Tailei was one of the founders and leaders of 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of China. A newly discovered Russian-language article written by Zhang Tailei in 1924, "Our Task in the East", reflects his views on the Eastern youth movement. He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a broad mass organization of youth in the colonial countries of the East, while guidance from the Young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nd assistance from 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of the imperialist countries were also important. This article was published after Zhang Tailei's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the Fourth Congress of the Young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where he stressed that the Young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nd 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of the imperialist countries should provide more assistance to the Eastern youth movement, which drew the attention of the Young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It can be said that Zhang Tailei inherited Lenin's spirit concerning the colonial question, made the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to devote more attention to the East. In a word, Zhang Tailei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Key words: Zhang Tailei, Young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the Eastern youth movement, colony

(上接第 173 页)

Economics Behind Art Conflict

—— A Reexamination of Ruskin-Whistler Lawsuit

CHEN Li, YUAN Jiahan

Abstract: The Ruskin-Whistler lawsuit is an important event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art. While previous studies mostly focus on their different artistic views,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the artistic dispute can be traced back to deeper socio-economic reasons. It explores into the neglected social theory of Ruskin in his later period and resorts to Marxist economic theory as well the consumption culture theory, in order to re-examine this lawsuit from the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of economics. The dispute between Ruskin and Whistler lies in their different concepts on art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when the society transited from the era of supply to that of consumption. Ruskin's economic theory focuses on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and conforms to Marxist economics. He believes that commodities have fixed intrinsic value and negates exchange value as well as consumerism, arguing that commodities should be priced according to the labor cost in production. Art differs from common commodities and undertakes the duty of promoting social morality. Whistler adapted himself to the changes of the times. His works gained public applause due to their avant-garde and novelty in a consumer society dominated by visual culture. His focus on form reflects the non-functional nature of commodities in the consumer era. Ruskin insists on the redemptive function of art, while Whistler's success marks the beginning of the era of the capitalization of aesthetics.

Key words: Ruskin, Whistler, price of art, labor theory of value, consumer culture